



文明交流史视域下的《格萨尔》史诗

□ 德倩旺姆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创作的一部伟大英雄史诗，与《江格尔》《玛纳斯》并称为“中国三大史诗”。作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并且仍然被众多艺人不断传唱的民间口头艺术，被誉为“世界最长史诗”“东方的荷马史诗”“仍然活着的史诗”。既然是一部史诗，《格萨尔》就有“史”和“诗”的两面性。《格萨尔》的“史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格萨尔王本身作为真实人物的历史事实，以及《格萨尔》、《格萨尔》中所包含的西藏与城内、域外各地区各民族文明交流的历史；而《格萨尔》的“诗面”，就是通过诗性思维和口传叙事手段，以丰富宏阔的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文本，追溯和记忆这种文明交流，礼赞和歌颂这种文明互鉴，这既是格萨尔艺人个人诗艺和口头技能的展现，也是藏族人民集体记忆和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

《格萨尔》史诗的诞生

早在公元前，藏民族的先民就已经出现在青藏高原，并在公元7世纪出现的雅鲁部落首领松赞干布的领导下，统一领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是一位雄才伟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制定法律，派遣使者到各个周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与文化，通过和亲等各种外交手段与周边各国建立了良好的往来，尤其密切了吐蕃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交往，造就了持续约两个世纪的繁荣。进入9世纪中叶后，吐蕃王室及青藏高原发生内讧、分裂、饥荒、洪水等各种天灾人祸，加上爆发声势浩大的起义，吐蕃王朝正式瓦解，藏族社会分裂，各股宗教与地方势力或结合或各自为政，人民陷于战乱与恐慌，并饱受各种苛捐杂税和繁重徭役之苦，厌倦征战，渴望安定。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结束了分裂的混乱局面，藏族社会稍见稳定，经济、文化等都获得了一定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格萨尔，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位英雄人物。藏文历史文献对格萨尔原型有记载，如成书于14世纪的《朗氏家族史》一书中记载有生活在多康地区的格萨尔邀请密宗瑜伽师前往岭地的历史。藏学家毛尔盖·桑木丹也明确阐述了格萨尔的原型，认为历史上的格萨尔出生于四川

甘孜阿坝草原，以“岭国”部落为核心统一了周边诸部落，并与当时在以今青海西宁为中心的唃廝囉等并列成为当时重要的几个地方政权之一。可见，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口头文本资料证实，格萨尔并不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的原型应该是一个生活在11—12世纪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这位统一周边部落的地方英雄人物的传奇，首先在当地人的口头进行歌颂和传播，逐渐与丰富宏大的民间口头文学和历史叙事传统融为一体，逐渐演绎成为一个体量庞大的史诗。在这样动荡的几个世纪中，《格萨尔》不仅吸收了藏族神话、谚语、民间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精华，同样也融入了藏族吐蕃王朝时期的历史事实，把吐蕃时期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明交流与文化交往艺术性地引用到格萨尔的传奇经历中。这体现了藏族人民对安定生活的渴望，对带领民众走向和平的英雄人物的崇拜，也是《格萨尔》的核心精神体现。

《格萨尔》史诗的传播

公元12世纪左右发轫于以三江源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后，《格萨尔》宏大的叙事传统向我国其他民族和地区传播，甚至跨境向周边地区和域外民族传播，形成了跨文化、跨语际、跨区域的传播模式，横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帕米尔高原和云贵高原广阔的史诗流传地带。在我国境内，《格萨尔》在十余个民族当中流传；在境外，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有传播，也成为不同族群之间文明交流、互相借鉴、人类文明不断相互影响并创新的重要佐证。因此，它既是属于我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秀口头文化传统，也是由很多国家地区和民族共享的重要文化遗产。

在《格萨尔》向不同民族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蒙古族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史诗学者达木丁苏伦在《格斯尔史诗的历史根源》中的研究，蒙古文《格萨尔》有7种不同的版本。其中，1716年的北京木刻本蒙古文《格萨尔》是最早的版本，共有7章。内容从格萨尔在天上之时起，到地狱救母为止，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格萨尔传记。从白族、普米族、怒族、纳西族等南方诸民族中传播的《格萨尔》

文本来看，其文本的语言形式完全是散文或以散文为主兼有少量韵文，从文本分层面可以认为是整理本、口述记录本，其篇幅也不算很长，多则3万字，少则几千字。另外，史诗中的人物名称、人物形象、居住环境、坐骑、武器、英雄最后的归宿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史诗最重要的崇高主题，即人间苦难、英雄诞生、娶妻报仇、救母或救妻、英雄返回没有多少变化。研究者把《格萨尔》文本分为分部本和分章本，分部本是由几部或多部（卷）来叙述格萨尔传奇经历文本，每一部既是单独的一个文本，也与其他部本相联系，共同形成完整的叙述，而分章本则是一部或一个文本分几个章节来叙述格萨尔的人生传奇。藏族的《格萨尔》多为分部本，而从藏族向外传播的《格萨尔》文本多为分章本。比如下拉拉克本、吉尔吉特本、巴尔蒂斯坦本等。

尽管由于地域、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民族各地区《格萨尔》的文类特征和叙述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都继承和发扬了作为宏大叙事的核心主题，即史诗的崇高性和神圣性。各个民族和语言的《格萨尔》都讲述了格萨尔王为救护生灵而投身下凡，率领“岭国”部落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推动众人和睦相处、建设美好家园的故事，体现了民族英雄救人民于苦难的崇高使命，反映了各族人民群众反对战争，向往安定、幸福生活，渴望和平社会的共同心理。《格萨尔》所秉持的团结人民、凝聚民心、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主题，是我国各民族共同认可的精神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现，也正是《格萨尔》在我国和域外得以广泛传播和广泛接受的重要基础。

《格萨尔》史诗的文明交流主题

《格萨尔》史诗一直都在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改变、不断扩充，可以说，这部史诗就是藏族历史记载和记忆叙述的重要载体。《格萨尔》每个部本的标题均体现了文化交往。如《汉地茶宗》中，我们能看到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以文学象征手法反映了吐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吐蕃与唐朝之间的茶叶贸易，中原的茶文化对吐

蕃的影响。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就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三条主线和众多支线组成，连接陕、甘、川、滇、青、藏以及南亚、中亚、西亚和东南亚各国，形成了巨大的交通网络，不仅将各地区、各族人民从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凝聚在一起，也推动了民族和睦与团结。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公元8世纪至9世纪，被吐蕃称之为“霍尔”的“回鹘”与吐蕃之间发生多次战争，《格萨尔》中的《霍岭大战》正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艺术化和史诗化叙述与记载。藏文的历史文献中随处可见“汉地王法之王、大食财宝之王、印度佛法之王、格萨尔军王”的记载，而这些基于历史真实的表述原貌原样出现在《格萨尔》史诗中，可以看出中原职官制度和法律制度对吐蕃王朝的影响，我们从吐蕃王朝历史中实际存在的制度也可窥见一斑；《大食财宝宗》，就是吐蕃时期与大食的各种贸易来往的艺术性再现；《印度佛法宗》，就是吐蕃时期引进佛法和弘扬传法的历史展现。另外，《姜岭大战》反映了藏族与纳西族盐的争夺历史；《蒙古马宗》反映了蒙古族与藏族同为游牧民族，关于马文化的交往交流历史；《象雄珍珠宗》《松巴犏牛宗》均艺术性地反映了吐蕃时期吐蕃与象雄、松巴等地区的争战、贸易等交往交流历史。

《格萨尔》是藏族文化中一颗璀璨明珠，在历史长河中同身边的兄弟民族不断地交流、传播，最终形成珠串，为祖国的华服增光添彩。多民族的《格萨尔》是藏族格萨尔史诗在流传过程中各民族人民对传统文化原则的坚守和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的自由的、有意识、有风格的创造，并经过文化交流和时间洗礼，最终形成的多民族共有的文化情结。对英雄的崇拜与对和平的向往，是南北诸多民族文化传播和文化交融的结果，同时也彰显了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宗旨。

历史文化典籍

（上接1版）

粮化冲动。建立预防粮价过度下跌机制，清理抑制粮价上涨相关措施，进一步强化价格支持措施，完善最低收购价、目标价格等价格保护制度。疏通资本等要素流向乡村的渠道。目前，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的倾向仍然突出，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和技术、数据等现代要素向乡村自由流动的渠道仍然不畅。解决乡村用地难，促进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享。解决农村就近就业难、融资难，吸引社会资本增加农业农村发展投入。解决引才难，建立农业科技优先发展政策体系。解决数字鸿沟，充分挖掘和利用农业农村数据资源的价值。

破除产业间互通互利的壁垒。打通种养生产链循环，科学布局口粮与饲料粮、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规模化养殖与小规模养殖，推进粮与饲、粮与肉、粮与菜、粮与果等协调发展。打通生产资料供应链循环，发展低成本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开展代耕代种代收、大田托管、统防统治、烘干储藏、科技支撑等服务供给。打通农业生产与加工产业链循环、生产与营销服务链循环、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循环。

关注农户创造价值与获得利润错配问题。农户作为农业价值链的核心和根本，应该从中获得应得的权利和收益。目前，种粮务农难赚钱，农户处于利润洼地，生产环节创造的价值与获得的利润不匹配。我国绝大多数耕地需要用来种粮，确保农民愿意种、有钱赚，就要避免粮价过低导致“谷贱伤农”。粮价太低制约了种粮对初次分配的贡献，也会强化非农化非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出自南北朝时期范缜《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夫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丁鸿用坏崖破岩的涓涓之水和干云蔽日的葱青之木勾勒出自然万物形成、发展、衰亡的生命景观，更关键的是蕴藏于其中的事物发展规律。

“微”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微，隐行也。”《辞海》解释“细，小，稍”。“微”本字是去掉双人旁之后的字，中间那部分是人形上有头发飞舞，右边大意是以手捋发。一根根的头当然是不容易看清楚 的，这就是“细微”隐晦义的由来。在我国古代，用“微”强调或凸显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故事很多。从《管子·霸言》“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到汉刘向《说苑》告诫“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再到丁鸿谏言的“禁微则易，救末者难”等警句，无不体现了古人对事物发展量变质变客观规律的把握，无不彰显了防微杜渐、慎独慎微的中国智慧。

做到防微杜渐、慎独慎微，是自胜之功，正所谓“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明正德十三年正月，王阳明奉命剿灭山贼。出征前，他给弟子薛侃写信道：“尝寄书仕德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破心中贼之所以难，是因为外界对人的行为和思想施加的影响终究有限，要想根除恶念、清正自守，还是要靠自我约束。老子《道德经》所谓“自胜者强”，正是因为自胜者有强大的自制力，因此能干事、能成事。

自律是靠自身约束的柔性方式从而达到一定的效果，而他律则是强制性守纪保证。在不良之事于细微之时靠着意念真诚、自我约束的信念坚定，但还要靠他者的监督和用发展的眼光及时掐灭“小恶”苗头在萌芽之际，做到悬崖勒马、正心明道。如若做不到“禁微”，在事物处于萌芽状态时不加以制止就会酿成大祸，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象箸之忧”的故事了。

箕子，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商纣王的宗亲，他看到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而害怕。箕子认为，“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但因纣王的昏庸不能听取箕子的谏言，而在其后五年周国征伐纣王时，纣王自焚于摘星楼，商灭亡。箕子“畏其卒，故怖其始”，反映了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 潘洪娥

他强烈的忧患意识，也说明了强有力制约的重要性。

无病早防，小病早医易制，突出“源头治理”，但越过事物萌芽、发展阶段，最终至“末者”，酿成难救的大错，就要加强“末端治理”，正所谓“治已病”。唐代大医家孙思邈则将医生分为上中下三等，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阶段。医术最高超的医生治疗的是尚未发病之时的身体，即“未病”；医术次之的医生是治疗即将发病之时的身体，即“欲病”；医术最不精明的医生是治疗已经发病时的身体，即“已病”。此中医理论在强调治“未病”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治“已病”的紧迫性。一次魏文王在问其兄弟三人的医术时，扁鹊回答：“长兄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中兄治病，是在病情初起之时；而我治病，是在病情严重之时。”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小隐患转化成大风险、小管涌变成大塌方的道理从来都是“知者容易，行者难”。因此，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不仅应当具备防微杜渐、慎独慎微的意识，时刻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更要有禁于未然的眼光和行动。

中华文明智慧

的扶持政策，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明确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要求。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也是广大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故土。农村是农民常住的家园，乡村产业是近两亿人就业的产业。乡村振兴，是让农村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而不是赶农民上楼，更不是催农民进城。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要留住乡风乡韵乡愁，照顾农民感受，紧盯种粮挣钱、就近就业、就近入学、看病便利等农民急需、普惠性高、兜底性强、带动面大的牵引性工程，久久为功，扎实推进。

以公平正义为底线构建优先发展制度体系，五级书记要懂“三农”工作、会抓“三农”工作，分管领导要真正成为“三农”工作的行家里手。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主渠道作用，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坚持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土地、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面向农业农村的协调配合，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更加突出耕地保护、环境保护与乡村发展政策的协同，把既能防止资本“跑马圈地”，又能防止“吓退企业”作为落实政策的双重考核目标。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